

開眼看「中國」： 在《澳門新聞紙》發現世界、 國家與自我

• 卞冬磊

摘要：本文分析了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的世界認知和閱讀《澳門新聞紙》的關係。以往研究較多描述《澳門新聞紙》的內容，忽視其作為晚清時代「新媒體」的特質，因而難以解釋認知的動態變化與所見「世界」的交往特性。本文認為，新聞紙是一種新的知識類型，以報導近事和評論為主，有別於書籍或地圖提供的靜態知識。《澳門新聞紙》描繪的「世界」互相聯繫；「國家」不是抽象名詞，而是由具體事件構成的運動之主體；更重要的是，一個「外部視角」下的「中國」也浮現出來。在這個層面上，林則徐翻譯、閱讀新聞紙的意義，可以表述為「開眼看『中國』」——以一種整體性的外部視角審視「世界關係中的中國」。新聞紙提供的動態知識和外部視角，對於近代中國走出對外國的「幻想」、重新確立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

關鍵詞：《澳門新聞紙》 林則徐 世界 國家 自我

作為「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①，林則徐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地位已無需贅言。他不只具有因為禁煙而締造的民族英雄形象，其作為世界認知轉變的啟蒙者，更加引人矚目。即如歷史學家蔣廷黻所說：「林則徐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是百戰百勝的，……真的林則徐是慢慢的覺悟的了。他到廣東以後，就知道中國的軍器不如西方，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②

* 本文為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近代報刊閱讀史及其史料庫建設（1815-1919）」（項目編號 15CXW003）的研究成果。

誠如其言，林則徐的「慢慢的覺悟」——對世界秩序的重新認識，除了源自與外國人直接交涉、地方社會上「道聽途說」外，主要得益於翻譯外國書刊——包括《四洲志》、《華事夷言》和《澳門新聞紙》^③。以媒介形態分類，前兩者為書籍，後者則是一種「新媒體」，因此別具意義。誠如論者所言：「雖說翻譯西書風氣，在明季就初見端倪，但通過翻譯報紙了解『夷情』，在此前中國歷史上從無所見，林則徐此舉不說是石破天驚，也確屬盤古開天地來的新創舉。」^④所以，當後來者追溯中國人閱讀新聞紙的經驗時，林則徐常常被視為開端。譬如張之洞就曾說：「中國自林文正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詳情。」^⑤《澳門新聞紙》的歷史意義由此顯現。

《澳門新聞紙》是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為「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⑥所進行的書報翻譯活動之成果，其內容譯自當時西人在澳門發行的《廣州新聞報》(*The Canton Press*)、《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以及少量的《新加坡自由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過去已有不少研究考證了《澳門新聞紙》(1839年7月16日到1840年11月7日)的底本、譯者和內容，尤以蘇精近期編撰的《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一書最為細緻^⑦，不僅收錄了《澳門新聞紙》全本，並將中英原文一一並列對照。此外，陳勝彝對《澳門新聞紙》內容的概述堪稱完備。他指出，《澳門新聞紙》將「英國政府從縱容、支持對華鴉片貿易到為維護鴉片貿易而發動侵華戰爭的動態置於中心位置」，而遺憾的是，「由於畢竟是新聞，這些知識難免過於簡單、零散、缺乏系統、條理的說明，比如英美的政治制度，只是不斷地在新聞中出現各種近代政治機構的名稱而已」^⑧。

本文認為，陳勝彝這個略含批評意味的評價，恰恰體現了新聞紙作為晚清時期新媒體的特性。作為現代「文化形式」^⑨，儘管新聞紙的內容簡單零散，缺乏系統，卻是一種新的知識類型：「澳門……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照知。」^⑩新聞紙每七日更新一次的動態消息，描繪的是各國進行的交往關係，顯然有別於書籍偏向靜態的知識形態。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再將書、報混在一起，籠統地談論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後對世界的認知變化；而應進一步探究：通過主持翻譯、閱讀和批註新聞紙，林則徐看到的「世界」有何特別之處？其認知變化的過程如何產生？通過新聞紙「觀看」世界的方式，對認識「中國」又有何特殊的意義？

1830年代，在廣州和澳門出版、流通的外國新聞紙，雖處在帝國的邊緣地帶，仍給寥寥數位中國譯者和讀者帶來了一種認知世界的新方式。通過細讀《澳門新聞紙》全文，本文發現，新聞紙通過對當下事件的報導和評論，將原本屬於抽象空間、較為孤立、靜止不變的「世界」和「國家」，轉變為一個具體可辨、互相聯繫、持續運動的主體。通過持續翻譯、閱讀各類事件和評論——「集中在翻譯外人報刊中有關時事政策的反映、報導和評述」^⑪，林則徐不僅看到了一個互相聯繫中的新世界，而且第一次從「他者」的視角看到了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認為，將林則徐主持翻譯《澳門新聞紙》的歷史意義表述為「開眼看中國」——以一種整體性的「外部視角」審

視「世界關係中的中國」，可能更為貼切。從新聞紙觀察「世界」與「國家」，實質上也是尋找「他者」、進而發現「自我」的過程。

一 「朦朧一團」的西方

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是由「天下」觀念支配、以朝貢體系為表徵的一套交往規範。在這個秩序中，世界由漢字圈、內亞圈和外圈構成，中國處於中心，一些不太重要的國家分布在周圍。其中，外圈「一般由關山阻絕、遠隔重洋的『外夷』組成，包括在貿易時應該進貢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東南亞和南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⑫。新近的研究表明，中華帝國在1600年之前都是一個「開放的帝國」：「它在形成之時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並在漫長的歷史中保持對外來影響的開放，而不是一個拒絕外來影響的中央王國。」^⑬陳旭麓也認為：「歷史上的中國並非閉塞的孤島，它一直在注視着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⑭

但是就知識系統來說，「政教不能及的『天下(世界)秩序』確非清朝關注的重心，『外國』更可以說是清人政治觀念中最不受重視的部分之一」^⑮。傳統中國的世界知識——如果有的話，主要涉及周邊的朝貢之國；對外圈的印象，尤其是遙遠的西邊，向來是「朦朧一團」。如果說明代末期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傳教士帶來的世界地圖，曾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過些許影響^⑯，那麼到了清代，即便在朝廷內部，這種影響也幾乎消失殆盡。這可以從陳旭麓對清初編撰的《明史》之分析中看出端倪^⑰：

能夠明白列舉的歐洲國家還只有4個。即佛郎機(指葡萄牙，但有時又兼指西班牙)、呂宋(現在的馬尼拉一帶，當時此地為西班牙所佔，所以實際上是指西班牙)、和蘭(荷蘭)、意大利。在《明史》的初稿中，意大利是寫成歐羅巴〔歐洲〕的。雖然後來改了過來，但把意大利當成整個歐洲，畢竟反映了知識上的模糊。

由此可見，明代流傳下來的知識在清代已隨時間流逝而趨於式微。按照何偉亞(James L. Hevia)的說法，在鴉片戰爭之前，「清與西洋諸國(這是清的記載裏對歐洲的稱謂)的關係是模糊不清的，因為清對歐洲各個不同的國家並無清晰的概念」^⑱。

對英國的認知自然也是寥寥，儘管清中葉以前沿海官員或讀書人曾有《海國聞見錄》、《閩海紀要》這樣的作品，初步介紹過英國的地理、風俗和物產，但這種邊緣之作難以擴展其影響。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成為西方最強大的國家，並開始在廣州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形象才稍微具體起來。彼時，通過廣州官員的奏摺，朝廷多少了解到英國的一些近況，如「各外夷來粵貿易船隻，惟啖咭喇船大貨多」、「啖咭喇在諸夷中最为強悍」^⑲。但這些零散的印象無法構成知識，也就沒有力量挑戰既有的認知。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

(George McCartney) 來華，朝廷通過北京的外國傳教士方才弄清「該國即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1816年，英國外交官阿美士德 (William P. Amherst) 來華，兩廣總督蔣攸銛上奏，「至嘆咭喇貪狡性成，而與中土不通，其進貢為求貿易」²⁰。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人相隔二十三年來華，朝廷對他們的態度並沒有甚麼變化，「均以貢使看待，已證明中國對英國的了解不足」²¹。

1822年，兩廣總督阮元編成《廣東通志》，其中對「英吉利國」的描述，代表了道光初年人們對英國的基本認識²²：

荷蘭屬國，服飾相似。國頗富。……英機黎，一國懸三島，於吝因、黃祁、荷蘭、佛蘭西四國之間。……《海國聞見錄》、《明史》之丁機宜，《職方外紀》之諳厄〔厄〕利，《海國聞見錄》之英機黎，以輿圖核之，即英吉利，蓋對音翻譯無一定之字也。其國本在歐邏巴之西，為荷蘭屬國，後漸富強，與荷蘭構兵，遂為敵國。又不知何時佔據北亞未利加之地，稱加那大。英吉利稱歐巴之國為本國。雍正十二年，始來粵貿易。

上述這段文字，糅合書籍、傳聞等新舊資訊，蜻蜓點水般介紹了英國的地理、歷史與風俗，已屬不易。自道光朝開始，鴉片問題日趨嚴重，中英的衝突和交涉常有升級。反映到知識世界，「有關英國的著述也就不斷增多」²³，地理歷史、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以及社會風俗，均較以往詳備起來。譬如息力的《英國論略》，不僅詳述地理歷史，還涉及議會制度，如「設有大事會議，各抒己見，其國中尊貴者五爵，如中國之公侯伯子男，為會議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選忠義之士一二赴京會議……大眾可則可之，大眾否則否之」²⁴。

不過，這些偏向沿海的知識並沒有進入正統的政治世界。尤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道光皇帝在1839年決心處理鴉片問題、要求官員出謀劃策時，「英國」仍然很少出現在官方話語中。地方大員對於弛禁鴉片的議論，不可謂不熱烈，但二十九份奏摺中，只有三次提及「嘆咭喇」。著名的禁煙派代表、鴻臚寺卿黃爵滋提了一次：「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嘆咭喇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煙者以死罪，故各國只有造煙之人，無食煙之人。」廣西巡撫梁章鉅、河南總督麟慶批駁黃爵滋時順帶又各提及了一次，此外「別無英國一詞的出現」，這個現象「暴露出他們對鴉片走私情況的懵懂，對國際事務的無知」²⁵。

二 路線與水程：互相聯繫的「世界」

明代傳教士引入宮廷的新世界地圖，曾對少數中國讀書人的世界認知產生過衝擊，但從地圖中獲得的世界圖像是靜止的。鴉片戰爭前夕，人們對世界、英國和中國之間的交往，缺乏基本概念。有證據顯示，朝廷官員並不能確切地知曉鴉片貿易運轉的機構、路線和時間。林則徐初到廣州時，即奏報稱沿海文武官員「不諳夷情，震於嘆咭喇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²⁶。甚至鴉片戰爭結束後，他們仍然知之甚少。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朝廷命令欽

差大臣奕經向被俘英國軍官詢問英國「距離內地水程以及來華途中共經幾國」；同年四月，又諭台灣總兵達洪阿及台灣道台姚瑩，詢問英國「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至回疆有無旱路可通」^⑳。

「不通中土」，向來是中國對英國根深蒂固的認知之一。或許考慮到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林則徐十分重視中英之間船隻、信件、資訊往來的路線和時間。《澳門新聞紙》的報導及評論多次涉及兩國水路交通狀況。林仔細閱讀相關內容，並罕見地留下了一些批註。例如，1839年澳門8月17日新聞紙（七月初九日，第3則）^㉑刊登的內容涉及在華英人和英國本土之間的文書往來，「前十月十二日接到爾三月二十九日封來之文書，內有英國客商稟呈，懇求國王與中國定奪章程，比不能還價之洋商所立章程與總督定奪者更公道」^㉒。通過閱讀這則消息，林則徐除了知道文書內容外，還引起了他對兩地通信時間的關注，並在這則新聞後批註：「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義律發信之日起，扣至信到蘭頓（倫敦）日止，共計一百九十八日。又義律於八月十五日接到蘭頓二月二十七日發來之文，計一百七十日。」^㉓

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澳門10月19日新聞紙（九月十三日，第28則），這次刊登了英國當局的想法，內容涉及鴉片政策的具體問題，「聞說義律已接到上年十二月寄回國中，論禁止內河黃浦等處鴉片貿易回信，義律信中所說之事，樣樣俱准」。林則徐和上次一樣計算日期，留下批註：「自上年十二月發信之日起，扣至今年九月十三信到日止，往返共計二百八十七日。」^㉔通過這樣的方式，林大概算出從英國到中國的單趟路程可能需耗時四個多月。這個計算很可能影響了他的判斷：在上呈道光皇帝的奏摺中，林則徐以水程作為證據，以「該國所都囑頓地方來至中華，須歷海程七萬里，中間過峽一處，風濤之惡，四海所無，行舟至此，莫不股栗」，作為「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的證據^㉕。

除了以信件運轉的時間確認來回中英的水程外，林則徐也格外關注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繫。當然，這些聯繫常與中國有關。1840年澳門1月11日下篇新聞紙（十二月初七日，第65則）記述了一位外國商人和中國官員的來往，「講至都魯機（土耳其）出產鴉片時，欽差即問都魯機是否係米利堅（美國）地方？抑或米利堅所屬之地？我等回說不屬米利堅，只離中國約一月水程。欽差同各位大官府盡皆似是驚訝」^㉖。另外，澳門7月25日新聞紙（六月二十七日，第148則）報導了俄羅斯在中亞與英國爭霸的各種行為，林對俄羅斯到印度的路線異常關心，在這條消息後附有十分詳細的批註，譬如，「比特革（聖彼得堡）到印度之道路，並其道路之遠近，《地理志》書上沒有詳載，所以不能知其實。只按《地理志》之圖看來，有兩條道路可以到得印度。」^㉗

此外，隨着翻譯和閱讀的持續進行，路線和時間的計算結果也在不斷更新。澳門6月13日新聞紙（五月十四日，第132則）詳細敘述了中英之間的航線^㉘：

阿打拿船帶有蘭頓三月間之新聞，於四月初十日（即三月初九日）已到孟買。由英吉利到孟買共行了三十七日；復由孟買開船至新奇坡（新加

坡)，共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八（即三月廿七日）到新奇坡；在彼並未停留，遂即由新奇坡開船，行了七、八日，至五月初五（即四月初四日）到了中國。我等已接得蘭頓三月初四（即二月初一日）之新聞紙，此船由英吉利開船，共行了六十二日即到此處。大抵在二十年前，亦曾有一隻船由英吉利行了兩個月即到中國。

這條消息報導了西方船隻把新聞資訊從歐洲帶到中國的運轉過程。如蘇精所言，當時「廣州與澳門處於全球新聞鏈的末端，從倫敦經好望角、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或巴達維亞（荷屬東印度），最後才到中國，這條新聞鏈上的每個地方報紙也依次轉載前一地或數地報紙的內容」^⑥，這就給林則徐計算兩國水程提供了最佳素材。但是這條消息顯示，原來估算需要四個多月的航程，已縮減為兩個月，林不得不加以重視。在這條消息後又予以批註：「由蘭頓至孟買行三十七日，由孟買至新奇坡行十七日，由新奇坡至中國行七日，共行六十一日。」^⑦

《澳門新聞紙》一共有十一條批註，其中四條和路線、水程有關，顯示了林則徐對這個問題的關切。在這些路程的計算中，林主要在實用主義層面，重新審視了英國的貿易和軍事情況，因為這是他實際要處理的事務；而在認知上，他的所謂「慢慢的覺悟」——對世界和外國的了解，亦應在微妙的變化過程當中。事實上，從明代開始，中國與全球的交往已經展開。根據麥克尼爾父子（William McNeill & John McNeill）的描述，1450至1800年間，地球上的諸民族逐漸成為一個同一的共同體，從而進入「世界性網絡的編織」階段。其時，從「朝鮮、日本和（尤其是）中國南部的眾多港口啟程，經由東南亞的海島，繞過馬來群島，伸入印度洋地區，最後抵達波斯灣和紅海各個港口……印度洋海路通常來說是一個由眾多較小的連接點和作為傳輸和轉捩點的港口城市組合而成的聯合體」^⑧。

基本上，有清一代的鴉片就是通過上述海路到達中國。可惜在明清的時代氛圍裏，這些關於海外網絡以及網絡上互相聯繫的國家和城市的資訊，根本算不上是知識，官員士大夫也不屑關心。在孤獨的閱讀行為中，林則徐漸漸看到，在他要對付的英國和自己所在的「天朝」之間，有孟買、新加坡這些地方節點，圍繞這些節點還有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和交往活動。這個處於交往中的世界，和原來地圖上顯示的孤立國家大不相同。韓子奇對晚清地理觀念的描述，也許可以表達出林則徐對「歐羅巴」、「西邊」這些空間有點超前的新認識^⑨：

明清時期看到的世界與晚清時期看到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不同點在於明清的「世界」是分割的，東一塊，西一塊；而且每一塊地方自成一國，互不相關。反過來，晚清時期的世界是一個有機組合體，「五大洋、六大洲」連接起來成為一個環球系統，從地球的一端，連貫到地球的另一端。這種跨越海洋、山脈、陸地、河流的「環球意識」，不單是晚清世界的特點，也是晚清士大夫孜孜不倦向西方學習地理知識的原因。

三 動態中的「各國」

「國」，是《澳門新聞紙》中最常出現的字眼，也是報導的主要對象。涉及單數時，有「中國」、「英國」、「本國」等；涉及複數時，則主要是「各國」、「諸國」、「等國」。這從側面說明林則徐及其翻譯團隊在閱讀和翻譯過程中對世界認知的微妙變化：他們仍混雜使用「夷」、在外國國名加上「口」部（如「英咭喇」、「咪喇堅」）等，但輕視的意味已有所減弱。

葛兆光曾仔細考察明代傳教士利瑪竇繪製的新地圖及其影響，他指出：「從利瑪竇時代到乾隆時代，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古代中國對於異域（同樣也是對於自我）的知識，已經從『想像的天下』進入『實際的萬國』。」^④不過，這只是思想史的解讀。實際上，傳教士的地圖中呈現出來的萬國，可能較少引起社會認知的轉變，而且地圖上的萬國只是一些靜態的、不好辨認的名稱。由於當時少有持續而具體的事件發生，也缺乏實際的外交往來，人們難以將意義付諸這些國家名稱之上，因此，此時的「各國」最多只是一個抽象靜止的「空間」，而不是可感知的、正在運動的「地方」^⑤。

與地圖這種靜態媒介不同，新聞紙通過對近事的報導和評論，賦予國家具體的動態；由於向國家名稱持續注入事件和內容，抽象空間就變成了有生命力的主體。按空間層次劃分，《澳門新聞紙》對國家的報導大致可分為三類——單個國家、國家之間以及世界各國。這三個層次互相纏繞，交織在「中國」的周圍。

首先，單個國家近事和近況的報導，在《澳門新聞紙》中時有出現，如英咭喇（英國）、咪喇堅（美國）、佛蘭西（法國）、俄羅斯、普魯社（普魯士）、歐色特里阿（奧地利）、意大利亞（意大利）、荷蘭、印度、孟阿拉（孟加拉）、都魯機（土耳其）、緬甸、日本等，涵蓋了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也包括美國。其中，落筆最多的自然是英國，以該國的軍事、戰爭、貿易近況為主。多則新聞描述了英國在殖民地的戰爭情況，如1840年澳門1月11日新聞紙（十二月初七日，第60則）：「英國擾亂之地方，已將近平定。大呂宋〔西班牙〕與咖咧吐〔the Carlist party〕之事，亦將近平定。英國設立條例，禁做奴僕貿易，各律衙門不甚要行。」^⑥相比戰爭的報導，記錄更多的是貿易情況。尤其在林則徐實施較為強硬的禁煙政策以後，在英國國內市場引起了連鎖反應。如1839年澳門12月21日新聞紙（十一月十六日，第55則）：「有說及在中國繳鴉片之事。英國聽聞此信到後，各皆警動，即買賣亦不甚好，銀鋪利錢亦長【漲】至六分，又有向佛蘭西〔法國〕銀鋪借銀四百萬棒，又另有向花旗銀鋪借銀的。中國新聞一到國中，茶葉價長【漲】至加二，雖然價長【漲】，各莊茶葉尚不肯賣。」^⑦此類文字不勝枚舉，從中可知英國在鴉片戰爭前後的國內輿論、市場反應和軍事狀況。林則徐及其翻譯團隊通過持續地翻譯和閱讀，英國的形象不再是混沌一片。

除英國以及無法避而不談的美國、法國等國之外，俄羅斯出現的次數也較多，這或許反映了林則徐自身對清代邊疆的重視。《澳門新聞紙》多次報導俄羅斯與英國的爭端，如1840年澳門1月18日新聞紙（十二月十四日，

第66則)：「我等聞俄羅斯之權柄陰謀，有大害於我等東邊之權，即印度西邊阿細阿〔西亞〕、巴社〔今伊朗〕、緬甸等國。但俄羅斯之陰謀，雖是我等不能實在知道，然據我等之所知，處處皆有害於英國人。」^④有時討論也涉及到中國，如澳門6月13日新聞紙(五月十四日，第133則)：「俄羅斯之使者在二、三日內已離比特革到北京……凡中國人之思疑俄羅斯，比思疑別國更甚，斷不肯聽從俄羅斯人之言語，然我等亦必隄〔提〕防俄羅斯人之陰謀詭計。」^⑤

其次，有關各國之間的比較或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是稀疏平常。1839年澳門7月23日新聞紙(六月十三日，第2則)的描述十分典型，敘述了歐洲各國在當年的軍事實力：「本年歐羅巴洲各大國兵丁戰船之多寡，當以俄羅斯為最多……其次即算歐色特厘阿……弗蘭西戶口三千二百萬，戰船共二百二十隻，兵三十五萬，……英吉利……另印度各屬國之兵在外，所有戰船共載大炮二萬三千門。普魯社……乃耕種之國，並無戰船。」^⑥翌年澳門11月7日新聞紙(十月十七日，第177則)所談亦是歐洲各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英吉利、歐斯特里阿、俄羅斯、普魯社四大國，已經同都魯機國立定章程，又將此章程寫寄與依揖國〔埃及〕之巴渣官〔Pashaw〕，但未曾會合佛蘭西國。恐此事將來令佛蘭西與英吉利兩國不相睦。」^⑦這類新聞和評論，往往具有比較視野，各國的面貌在互相參照中清晰起來。

最後，是在更大的地理格局中描繪各國的近況，此類新聞數量超過第二種。因為林則徐及其翻譯團隊總是在中國的立場上認識世界，所以更加關注世界格局中的他國與中國，內容涉及茶葉、人口、面積、貨幣等。1839年澳門10月19日新聞紙(九月十三日，第27則)中，論者描述了各國的綠茶市場和貿易近況：「英咭喇之外，咪喇堅消用綠茶最多……歐羅巴內地消用茶葉，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為最……佛蘭西吃茶今亦加增。」^⑧翌年澳門5月16日新聞紙(四月十五日，第117則)中，論者將中國置於世界版圖中進行比較：「中國原自稱為天朝，故我等今在下文將各國分與中國比較。若論人民之多，即無一國可以與中國比較。在萬國之中，並沒有一國之人民臣子可與中國相等。」這條新聞提及的國家有俄羅斯、法國、奧地利、英國等，比較的內容涉及人口、面積、貨幣、軍事等，其結果是：「如此看來，中國一省即可以抵三國之人民」、「中國只可算是第二等多錢糧」、「在數國之中，中國有陸路兵丁最多」^⑨。

族繁不及備載，上述三種各國近況的呈現布滿了《澳門新聞紙》，描繪出一幅世界交往的新圖像。儘管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新聞「像一道躁動不安的探照燈光束，把一個事件從暗處擺到了明處再去照另一個，人們不可能僅憑藉這樣的光束去照亮整個世界」^⑩，但這本就是人們的局限，因為「觀看普遍的全景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眼睛必須尋找一些可以停駐的點」^⑪。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林則徐所處時代的知識氛圍——有新聞紙可讀和沒有新聞紙可讀的巨大差異，而將《澳門新聞紙》放回歷史情境中考察，那些事件就是一個又一個目光停駐之點，起了累積的效果：「翔實而周密的具體事件，起到了一種樣板或模式的作用，可以幫助人們認清他們生活與其中的那部分世界。具體事件有價值取向。」^⑫

四 鏡中我：「外部視角」下的「中國」

上文曾經提及，1839年朝廷官員上報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只有三次提及英國，不僅說明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生疏，也顯示中國人欠缺外部視角。即如茅海建所說：「當時清朝官員僅僅是從國內事務的角度來考慮禁煙的。」^⑤傳播學者庫利(Charles Cooley)說：「人所具有的這種自我感覺，取決於本人對他人內心有關自己看法的態度，這種社會自我可稱之為反射自我或鏡中我：人們彼此都是一面鏡子，每面鏡子都映照着對方。」^⑥傳統中國人很少擁有外部視角，因為從域外看中國，既無機會，也無必要，所以不能在世界格局中發現另一個自我。葛兆光指出：「中國在很長的時間裏，由於缺乏一個作為對等的『他者』(the other)，彷彿缺少一面鏡子，無法真正認清自身，在十九世紀，中國是在確立了『世界』與『亞洲』等『他者』的時候，才真正開始認清自己。」^⑦在這個意義上，《澳門新聞紙》尤如給林則徐打開了一扇窗，使他第一次有機會從外部看中國。這一通過閱讀發現自我的歷程，涉及對中國形象、話語和心態的重新定位，這些層面彼此糾纏、逐步深入。

其一，是西方對中國現狀的評述，與中國人的自我認知格格不入。《澳門新聞紙》上的中國，很少是天朝大國的形象，反而常被形容為一個誇大其詞的虛弱之國。尤其在戰爭前夕，對中國軍事實力的評價更有顛覆之感。例如，1839年澳門12月28日下篇新聞紙(十一月二十三日，第57則)中，論者評論說：「中國係地上至弱之人，印度之人亦不似中國之弱，當日取印度，我等北邊之兵沒有多少，即可奪為屬國。」^⑧翌年澳門12月3日新聞紙(十月二十八日，第78則)中，論者抨擊中國政府誇大其詞：「及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其所出之論，亦皆是恐嚇之語。……中國敵外國人，不過以紙上言語，真可謂之紙王論國矣！」^⑨具體到戰爭的細節，報導中也有直接的批評。澳門4月4日新聞紙(三月初三日，第103則)中，論者評述中國的水師極其弱小：「中國水手不諳駕船，略微操演，即為師船上之好水手，以歐羅巴最少小隊之兵，即可以攻敵他們之水師。」^⑩同日新聞紙(第104則)中，論者評價中國武器和戰術全面落後：「中國之火槍，係鑄成之槍管，常有炸裂之險，……中國又鑄有大炮……然皆粗笨無力，大約不能危害於人物。……中國兵丁行路，由兵丁自己走，若遇有不甚好走之路，就不肯行。」^⑪儘管林則徐並不同意此類評論，有時還批註予以反駁，但這一類來自外人的評價，在中國內部難以得見。

其二，是「話語政治」與觀念的衝突。劉禾曾仔細考察「夷」這個具有豐富歷史意義的字眼，認為「夷」字「始終是國家統治的中心如何處理與周邊他國、其他民族關係的重要隱喻」，揭示鴉片戰爭前後中英之間引發政治交涉的根源，從而指出，「語詞的衝突絕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兩個帝國之間的生死鬥爭，一邊是日趨衰落的大清國，另一邊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國」^⑫。《澳門新聞紙》中涉及話語衝突的議題頗多，1839年澳門7月16日新聞紙(五月二十五日，第1則)，刊登了外國人對林則徐寫給英國女王的信件的評論，此中「王」與「皇」成為爭論焦點：「英國王后二字，宜用皇字，非王字……若皇

帝寫書與英國王后，書中之語相宜者，英國領事自然為他們傳送，但若書中所論大黃及欽差等之上好等事，以壓管西邊美麗清潔之女子，又以恭順及君臨萬國等語，必無英國官府肯為他們傳送。」⁶⁰翌年澳門6月6日新聞紙（五月初七日，第128則），則表達了外國人對中國對外政策的長期不滿，尤其在稱謂方面的偏見：「三十年以來，我等所受之凌辱欺負，真係難以比較。中國人不獨不准我等與中國官府相交，乃除洋商之外，亦不准我等與中國之人民有一些來往，即各洋商因係與我等貿易來往，所以亦被中國人之輕忽鄙賤，即在中國人之示諭上，亦以紅毛、夷人、番鬼等名號輕賤我等。」⁶¹名稱有着寬泛的意義域，反映不平等的政治。「英國（人）」這個詞在中國，經歷「紅毛」、「番鬼」、「英吉利國」再到「大英（國）」的過程，顯示了兩國關係的強弱變化⁶²。

其三，與名稱纏繞在一起的，是對中國人世界觀的指責。這些層面觸及了世界秩序最深層的內核，也最容易引起反思。如1839年澳門12月14日新聞紙（十一月初九日，第47則）：「我等深奇中國人比別國人早得王化，今別國有王化亦有勝於中國，而中國仍以外國王為暴虐之王，皆因中國早已得王化，而視外國尚係赤身蠻夷。」⁶³同日新聞紙（第48則）直接批評中國對外國事務缺乏了解：「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國事務，故中國官府之才智誠為可疑。中國至今仍舊不知西邊，猶如我等至今尚未知阿非厘加〔非洲〕內地之事。」⁶⁴翌年澳門6月20日新聞紙（五月二十一日，第134則），則點出了中國人缺乏地理知識：「蓋中國之人因為盡皆以為英吉利不過係海涯之國，以荷蘭人比英國之人，以為不過係一小點地方而已，此外即在別處沒有地方矣。」⁶⁵在當時的氛圍下，地理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英國人清楚知道，「天下」觀念樹立起來的天朝大國形象，可以從地理層面予以解構。

如果林則徐真的「覺悟」了，這一「鏡中我」反射出來的中國——無論是弱國形象，還是落後觀念，對他來說都應是不小的刺激。到廣州任職之前，林歷練豐富，見多識廣，但作為經世派的代表人物，他「主要關心的是國內的政局問題……這些問題涉及鎮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改革。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別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⁶⁶。換言之，林則徐關於中國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其視角總是困於國內，最多延伸至邊疆，並在「天下」觀念和朝貢體系的支配下運作。正如段義孚所說：「長期居住於某地，使我們能夠熟悉該地，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從外部審視它，或基於自身的經驗反思它，那麼它的形象就缺乏清晰性」⁶⁷。因此，新聞紙對林則徐的意義即在於可以「由外向內」觀看中國。儘管他在《澳門新聞紙》只留下十一條批註，也沒有太多證據直接證明其觀念的變化，但至少在觀看的層面上，林則徐看到的「世界」/「中國」已然不同。

五 餘論：十九世紀的新聞紙與「外部視角」的擴展

古代中國「建構異域想像」的資源主要有三類——旅行記、《職貢圖》及神話傳說寓言。如葛兆光所指，「在一個尚不能靠舟車所至來親自了解世界的時

代，人們也只能借助類似《山海經》這樣的神話、《職貢圖》這樣的圖像和旅行記一類的見聞來建構世界，只有在這些摻雜了幻想、傳聞和實際觀察的知識中，總是滲透了觀察者自己的固執、偏見和想像」^⑨。不過，即便舟車完備，人們也不可能完全憑藉親身經歷去了解外部世界，閱讀仍然是識字的人超越「行動空間」最好的方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讀書人所能接觸的媒介類型沒有變化，還是神話、圖像和旅行記，因此，「古代中國的世界圖像在相當長時間內，並沒有一下子徹底的變更」^⑩，人們對世界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摻雜着幻想、傳聞和實際觀察的程度，也屬自然。

林則徐組織翻譯、閱讀新聞紙的意義，在於其打破語言和文化隔閡，在中文世界引入了一種新媒體，開拓了一個觀看中國的新視角，從而走出了對外部世界的幻想。其時，雖然一批傳教士在廣州創辦了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但該刊以宗教內容為主，新聞寥寥無幾，缺乏時效，在媒介形態上更接近書籍；而同時期被翻譯的地理書，在呈現世界的靜態構成上有顯著優勢，但對展現世界的動態與各國的交往則無能為力。

因此，林則徐是獨特的。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只有新聞紙才具有應對變動不居之世界的能力——透過接二連三的事件報導與評論，原本朦朧一團的西方，成為互相聯繫着的世界，抽象難辨的國家也變得具體可見；更重要的是，一個用外部眼光審視的中國也浮現出來。這也許就是孔飛力(Philip A. Kuhn)對魏源提出的疑問：明清時代的中國「需要以更為精緻的全球性知識為基礎，對明代的海洋戰略予以重新改造」，那麼「是否有一個群體，能夠以一種帶有全國性的視野和覆蓋面，來應對全國範圍出現的各種挑戰」^⑪？

然而，林則徐又是孤獨的。1839到1840年之間，在廣州進行的翻譯和閱讀新聞紙活動只有思想史的意義，對當時的社會和知識沒有很大影響——儘管《澳門新聞紙》的部分內容被魏源《海國圖志》引用。鴉片戰爭總體上悄無聲息，「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⑫，沒有引起任何政治變革。由於缺乏大眾傳媒，社會傳播微弱，當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戰爭的發生，更不要說引起公眾輿論了。

在林則徐之後，有少數沿海官員延續了他的做法，繼續翻譯西方新聞紙，但只限於實用主義的層面。兩廣總督徐廣縉是其中一員，他的一些奏摺是根據新聞紙寫成的，譬如1850年9月27日，即有奏摺上報稱：「至臣等前次所奏，購得新聞紙，內載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欲換台灣地方為港口。」^⑬隨後數年，當中外交涉的重心從廣州移至上海時，地方官員同樣繼承了這個慣例，翻譯出更多新聞紙，以便掌握「夷情動態」。這種零星翻譯、閱讀和奏報的狀態持續到1861年終有所變化。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比較講求實際的官員們在震驚之餘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並「決心履行中國的條約義務，使它的外交活動現代化」^⑭，其結果是設立了一個類似外事署的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機構的公文〈通籌夷務全域摺〉特別提出了將翻譯新聞紙常規化的要求^⑮：

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請飭按月諮報總理處，以憑核辦也。……近年來臨事偵探，往往得自傳聞，未能詳確。辦理難期妥協。各國新聞紙

雖未必盡屬可信，因此推測，亦可得其大概。廣州、福州、寧波、上海舊有刊布，名目不同；其新聞各口亦當續有刊本。應請一併飭下欽差大臣及通商大臣並各該省將軍、府尹、督撫，無論漢字及外國字，按月諮送總理處，庶於中外情形瞭如指掌，於補弊救偏之道益臻詳審。

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將新聞紙的翻譯和閱讀，納入了制度層面。起初，地方督撫「自行讓人翻譯海外情報用於行政，而洋務局繼承了這種做法」，「總理衙門和李鴻章都從1860年代開始把翻譯通商口岸發行的歐文報紙作為了解海外情報的一種方法」^⑥；隨後各通商口岸、地方督撫開始把翻譯、閱讀新聞紙作為一項常規事務，許多官員成為消息靈通人士。僅以1868年薛福成正月初四的日記為例^⑦：

新聞紙云：十一月廿三日，淡水地震，人多死者。

英國與緬甸立約，要在意里猾低及巴摩等地方開路，直抵中國雲南省，以便印度、緬甸等國到中國西界通商。

去年法國教頭為高麗人殺死，起兵攻之，克江華城，既而退去。

相似的描述在他的日記中汗牛充棟，所錄均是西洋、東洋、俄羅斯等國的動態，「各國」豐富而具體。芮瑪麗 (Mary C. Wright) 指出，「閱讀外國報紙和公共文獻，以便與變動不定的世界事務同步而行」，是統治時期顯著的政治文化，「『中興』官員懂得了利用報紙，不僅僅是因為報紙提供了了解外國信息的一種渠道，而且還在於它同時又是反映外國人對華觀感的工具」^⑧。

上述引文中，「與世界事務同步」，「了解外國信息」，「反映外國人對華觀感」，這些閱讀新聞紙的功效，不過是林則徐組織翻譯和閱讀《澳門新聞紙》的翻版。不同之處在於，讀者從寥寥幾人，擴展至東南沿海和通商口岸的部分官員群體；從悄悄進行變成半制度化和公開化。然而，1860年以後的清代社會，大眾傳媒仍然極其匱乏，通商口岸之外的人很少能夠接觸西方新聞紙，也很少能與外國人交往，因此「由外向內」看的視角仍然稀缺。對尋常中國人而言，真正開始看見和理解世界、國家和自我圖景的關係，要晚至1895年以後上海新聞紙的普及了^⑨。

註釋

①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6。

②⑦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16-17；16。

③ 《四洲志》譯自慕瑞 (Hugh Murray) 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參見陳勝旻：〈關於林則徐研究的若干史實補正〉，《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頁1-14。《華事夷言》譯自唐寧 (Charles T. Downing) 的《番鬼在中國》(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參見蘇精輯著：《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台北：斯福齋，2016），頁491。

- ④ 黃旦：〈林則徐為何不辦報？——讀中國新聞史偶記〉，《新聞記者》，2012年第1期，頁74。
- ⑤ 張之洞：《勸學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131。
- ⑥ 林則徐：〈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載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765。
- ⑦ 蘇精：《林則徐看見的世界》。
- ⑧ 陳勝旻：〈《澳門新聞紙》的翻譯與林則徐走向「近代」的開端（上）〉，《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頁62；〈《澳門新聞紙》的翻譯與林則徐走向「近代」的開端（下）〉，《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頁52。
- ⑨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著，劉藝娉譯：《新聞的力量》（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頁11。
- ⑩ 梁廷枏：《夷氛聞記》，收入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編：《鴉片戰爭》，第六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頁38。
- ⑪ 陳原：〈林則徐譯書〉，載《書林漫步》（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87。
- ⑫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一種初步的構想〉，載費正清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2。
- ⑬ 韓森（Valerie Hansen）著，鄒勁風譯：《開放的帝國：1600年前的中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2。
- ⑭⑰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頁27。
- ⑮ 羅志田：〈譯序〉，載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16-17。
- ⑯⑳㉑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379；458；379。
- ⑲ 何偉亞：《懷柔遠人》，頁41。
- ㉒⑳㉓ 龔纓晏：〈鴉片戰爭前中國對英國的認識〉，載黃時鑒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247；249；253。
- ㉔ 王家儉：《清代研究論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80。
- ㉕ 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330。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58。
- ㉖ 轉引自龔纓晏：〈鴉片戰爭前中國對英國的認識〉，頁254。
- ㉗㉘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94。
- ㉙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竄外船嚴行懲辦片〉，載《林則徐集·奏稿》，中冊，頁649。
- ㉚ 齊思和：《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46、47。轉引自王憲明、蔡樂蘇編：《中國近現代史述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頁32-33。
- ㉛ 本文引用之《澳門新聞紙》史料，來自蘇精輯著的《林則徐看見的世界》一書，但為兼顧未能閱覽該書之讀者，所有引用均標明《澳門新聞紙》原文日期。例如「澳門8月17日新聞紙（七月初九日，第3則）」：「8月17日」為陽曆日期，一般與所翻譯之外國新聞紙日期相同；「七月初九日」則為當日陰曆；「第3則」為蘇精一書所標註。第1至57則以及第73至80則「補遺」為1839年之《澳門新聞紙》，第58至177則為1840年之《澳門新聞紙》。
- 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蘇精：《林則徐看見的世界》，頁54；55；129；223；412；15；379；212；194；231；380；53；488；122；355；356；199；265；318；322-23；52；373；167；168；381。本文引用之「蘭頓」、「佛／弗蘭西」、「歐色特里／厘阿」等，均按蘇精原書；同時，「英咭喇」、「咪喇堅」等，有時有偏旁「口」字，有時則無，亦按蘇書。蘇書除部分人名、地名因電腦無字而省略「口」部外，均遵《澳門新聞紙》原文。

- ⑳ 林則徐：〈欽差大臣林則徐等奏為英國非不可制請嚴諭將英船新煙查明全繳片〉，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673-74。
- ㉑ 蘇精：《林則徐看見的世界》，頁379。筆者將原文的陰曆日期加上括號，以便閱讀。
- ㉒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著，王晉新等譯：《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51。
- ㉓ 韓子奇：〈開眼看世界——論晚清地理教科書的全球圖像〉，載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4。
- ㉔⑨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載《宅茲中國——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敘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90；85。
- ㉕ 普瑞德(Allan Pred)著，許坤榮譯：〈結構化歷程和地方〉，載夏鑄九、王志弘編：《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9)，頁119-20。
- ㉖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259。
- ㉗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台灣國立編譯館，1998)，頁155。
- ㉘ 默頓(Robert K. Merton)著，唐少杰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頁787。
- ㉙ 庫利(Charles Cooley)：〈初級群體與鏡中我〉，載周曉虹編：《現代社會心理學名著菁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271。
- ㉚ 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00、52。
- ㉛ 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大清王朝體制鈐壓下的漢譯泰西國名〉，載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201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59-127。
- ㉜ 徐中約：〈晚清的對外關係，1866-1905年〉，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144-45。
- ㉝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頁14。
- ㉞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4、17。
- ㉟ 徐廣縉、葉名琛：〈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報已拒絕英人至台灣購煤其換港一事尚無照會摺〉，載《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七冊，頁1034。
- ㊱ 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載《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頁68。
- ㊲ 〈奕訢等關於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奏摺〉，載熊志勇、蘇浩、陳濤編：《中國近現代外交史資料選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頁63。
- ㊳ 川島真著，田建國譯：《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12。
- ㊴ 薛福成：《薛福成日記》，上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頁1。
- ㊵ 芮瑪麗(Mary C.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99、300。
- ㊶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載《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頁226-51。